

启蒙的走向(1989)

李泽厚

一、启蒙与救亡

1.1986年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其后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我提出和初步论证启蒙与救亡作为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开始是相辅相成,而后是救亡压倒启蒙。

这论点遭到批评和反对。理由之一:启蒙是在救亡呼唤下发生的,即五四的启蒙归根结底仍在救亡。

这似无的放矢。因不仅五四,而且上起戊戌,中经辛亥,梁启超、谭嗣同、邹容诸人的启蒙论著和活动,从时务学堂到《新民丛报》,都是为了救亡,这一点我已反复说明,关键在于,经过戊戌、辛亥之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文化上,认为只有革新文化,打倒旧道德旧文学,才能救中国,因此不同于以前康、梁、孙、黄把重点放在政治斗争上。但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主要是日本的逻辑)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三十年代,五四的启蒙方面便曾遭到瞿秋白等人的严厉批评;何干之等人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更不过是唤醒民众参加抗战的宣传鼓动,即救亡活动之一个部分而已。

2.救亡走着自己的路,即中共领导的农民战争之路: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其他一切都围绕、配合、服务于这斗争,包括延安整风运动。十年前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时,曾有文章(周扬)认为五四是第一次启蒙运动,延安整风是第二次启蒙运动,启教条主义之蒙。我对此论颇为怀疑。延安整风是一次思想整肃运动,即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

想,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民主主义等等。它与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启蒙思潮恰好背道而驰。这思想整肃运动在当时有其极大的现实合理性:为了救亡。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条件下,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团结队伍,组织群众,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一切其他的课题和任务都得服从和从属在这个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主题之下,这难道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这整肃从思想上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3.武装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终于站起来了,再也不受任何世界强国(包括美、苏)的欺侮。于是,在救亡历程中,特别是在军事斗争即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制度、传统、习惯……受到了极大的肯定,被固定化、形式化和神圣化。出身成分、纪律秩序、供给制式的平均观念、一言堂的军事长官意志、“相信和依靠组织”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做驯服工具”的螺丝钉哲学(刘少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等等,无一不作为“革命的传家宝”被广泛地长期地论证、宣传、教育,并推行给全社会,成为某种普遍状态和普遍意识……

以后又如何,大家都知道。

4.这就是我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谁也没法再去改变这一行程。问题在于今天有无勇气去正视它、提出它和讨论它。

二、激情和理性

1.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从客观形势说的;如果从主观心态看,则理性与激情的错综交织,是另一个双重变奏,它可以作为五四

作者简介:李泽厚,男,著名哲学家,现居美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的另一特征。并且影响久远,以至今天。

启蒙当然以理性为向导和标志,五四曾以常识的理性来衡量一切,来打破迷信、否定盲从,解除精神枷锁,它提倡“科学的人生观”。

另一方面,无论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或是广大学生的爱国活动,五四充分洋溢着冲破重重网罗的激昂热情。如果理性引导人们去思索去认识,那么热情则引导人们去否定去行动。热情与理性在当时的结合,发出了轰然巨响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波,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

这批判曾经是理性的,它分析、论证了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的虚伪、残暴种种祸害。

这批判更是激情的,它宣泄了巨大的愤怒和仇恨。

2.也很明显,两个方面比较起来,激情更多一些。这不但使所谓“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思维模式风行一时,而且也造成先是笼统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后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笼统否定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它以一个空悬着的完美乌托邦作为追求目标。

救亡压倒启蒙后,激情与革命的结合成为巨大的行动力量,而所谓“否定的辩证法”则变成了“素朴的”情感反射和简单的“阶级”语言(如立场、观点、方法之类)。“国际高歌声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本为理性所点燃的激情之火却不断地烧灼着理性自身。五四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取得了成果,也种下祸根。它也表现为对成功不去作理性的分析和消化;以激情为内容的一切经验被当作革命的圣物,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去继承去光大。

3.于是,有了“文革”。“文革”表面上也有某种理性的理论指导,如《共产党宣言》中的“与传统彻底决裂”,但其根底却仍然是某种道德主义加乌托邦的狂热。分析的、建设的理性完全失落,人似乎陷在癫狂中。

4.之所以如此,也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因为没有宗教,情感的狂热与某种经验的实用理性相结合,便排开现代的科学理性而走向这种“癫狂”。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反对传统中,可以看到儒道互补的情理和谐经常是以这种破坏和谐、癫狂盲动来作为否定的。这是值得密切注意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5.“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代中国的时髦意识,从彻底反传统到倡导非理性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似乎又一次重复着理性不足、激情有余。尽管它们也有某种理论形态作旗号,但许多时候却连形

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也不遵守,从概念模糊到论证过程不遵守同一律,以至“四名词”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甚至不作任何论证,公开用“他妈的”、“操蛋”之类的词汇来替代说理,等等。

6.因之我以为,今天要继续五四精神,应特别注意发扬理性,特别是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学的体现,即如何寓科学精神于民主之中。从而,这便是一种建设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设。不只是激情而已,不只是否定而已。

7.发扬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建立形式。五四成就最大的正是白话文、新文学、新史学(如疑古)等现代形式的建立,它们标志“游戏规则”(Wittgenstein)的有意识的变换。由新词汇、新语法、新文体所带来的崭新的观念、内容、思想和规范,这形式便不是外在的空洞的框架,而恰恰是一种造形的一种力量。它以具体的形式亦即新的尺度、标准、结构、规范、语言来构成,实现和宣布新内容的诞生。在这里,形式就是内容,新形式的确立就是新内容的呈现,因为这内容是由于这新形式的建立才现实地产生的。这正是五四的白话文、新文学不同于传统的白话文、白话小说之所在。

可惜的是,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五四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这种现代新形式。启蒙所提出的民主意识,始终没有通过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法律形式建构出来。或者初步构造了,却得不到严格遵守和执行。如多次制定宪法,但常常等于一纸空文,并无权威性可言。其他法律更付诸阙如。于是民主永远停留在空洞的条文或激情的口号上,行政则始终凭借和依靠少数人制定的“政策”,灵活办事,主观随意性极大。科学也由于没有论争形式和论争习惯的建立,不但产生后来丝毫不讲道理的所谓“大批判”,而且惟我真理在手,不容他人分说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心态一直广泛地影响至今。

8.可见,重要的是真正建立形式:首先是各种法律制度和思想自由的形式。建构理性的形式,树立法律的权威,乃当务之急。如果说,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在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就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惟一通道。因之,多元、渐进、理性、法治,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具体发扬,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启蒙在今日的走向。

1989年4月

(责任编辑:庄园)